

■首都文学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

9月3日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这是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最大的好日子,是全世界华人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日子。我们今天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亲历者会越来越来少,我们小时候还有机会听一些老人讲他们的亲身经历,可是,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就完全没有机会从亲历者那里了解那场战争了,将来人们只能通过历史资料来了解那场战争,通过文艺作品来再现那场战争了。

对于一般人来说,文艺作品是他们了解过去最直接也是最形象的方式,可是,我们有些反映抗日战争的文艺作品特别是一些影视作品干脆就戏说,娱乐化,很不好。

这样的后果是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失信,给人们的印象是抗战很容易,打鬼子太简单了。抗战的艰苦性、残酷性无法体现出来。从1931年的“九一八”起,抗战就开始了,算起来应该是14年。当时在白山黑水之中,就有了东北

前些年,我完成了历史文化散文集《故国中山》后,曾认真思考了河北中西部的古中山国地域的文化精神特质。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我试图给悲歌慷慨找个“形象代言人”。

搜寻几十天之后,一个名字跳跃眼前——平山团!这个部队转战晋察冀,令日寇闻风丧胆,战功赫赫,被毛泽东几次表扬,被聂荣臻嘉奖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让“子弟兵”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别称;他们垦荒南泥湾,创造了“陕北的好江南”,是“模范中的模范”;南征北战,历尽千难万险,创造了“第二次长征”;平山团又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保卫延安,三战三捷,鏖战大西北。最后进军新疆,屯垦在祖国的西部边疆。

开始寻找后,来自这块地域强大的热情几乎对我形成了“炙烤”,资料纷纷而来,线索不断提供,我采访到100多位老兵、老党员以及烈士后人!

早在大革命时期,一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在这块播火耕耘,打下红色基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到达河北平山县扩军。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1500多人参加了平山团,后整编为120师的359旅718团,从此浴血奋战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八年抗战,平山县前赴后

为了胜利的纪念

□张 者

抗日联军,就有了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他们孤军作战,最后都壮烈牺牲。所以抗战是艰难的,不是像一些电视剧那样,几个小孩子就能把鬼子玩弄在手掌之中,就像打游戏一样简单,这样的抗战作品将会对年轻的一代产生非常坏的影响。

我邻居的孩子是个初中生,他是个军迷,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和电视剧。他了解我们的新型驱逐舰052D有多少个垂直发射孔,他了解我们的五代战斗机歼20和歼31的不同用处,可是他却问了我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他说,我已经看过了很多打鬼子的电视剧,当年日本鬼子来到中国,不是来挨打的吗?鬼子挨了打,为什么还让他们道歉?

这个问题让人十分意外,抗战打游击在孩子们那里成了打游戏。事实上打

游击还真不是打游戏,那是要死人的。日本鬼子可不是什么受害者,虽然现代的日本历代政府总是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每年都在纪念原子弹爆炸日,如今他们还在不断拜鬼,幽灵要复活了。

我们只能告诉现在的年轻一代,当年不是我们先打鬼子,是鬼子来打我们,我们是在抗战。抗战不是简单的打鬼子,鬼子不好打,因为我们装备差,打不过人家,大半个中国都丢了,只有全民抗击。那时我们家逃荒从豫东的黄泛区到了豫南,现在村里的老人还能唱出当年的童谣:“国军来征粮,冠冕又堂皇;鬼子来抢粮,又抢花姑娘。”这童谣激发了我的灵感,后来就有了我的长篇小说《零炮楼》。我们对抗日战争的书写还远远不够,真正伟大的作品还没有诞生,我们的作品远远配不上抗日战争这个大题材。

寻找平山团的感悟

□程雪莉

弟执拗地说,俺就叫王家川!俺爹娘说了,俺要是牺牲了,俺还有个弟弟来,还叫王家川!前仆后继!慷慨不弟!

在八年抗战中,这个山区县,人人争相参加自卫队、农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组织,可谓人人皆兵,成为晋察冀抗战史上的奇迹。聂荣臻率领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在平山县战斗生活三年零两个月,平山县涌现出大批抗战英雄群体和模范人物:铁军五团、铁血剧社、回舍大枪班、寇冠秀、韩增丰、韩怀智、曹火星等。而日寇在平山制造了100多起惨案,屠杀14000余人,史所罕见。但是,侵略者在这里村村遇反抗,人人唱慷慨。狼牙山五壮士、井陘的挂云山五壮士,平山的刘家坪十二壮士,层出不穷。冀城的梅花镇惨案中,一个农民看见儿媳被侮辱,捡起地上的日本战刀,连劈两个鬼子;正定县一个普通农民张三月在自家院子里,拿起铁镐奋勇而战,面对8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毫无惧色地搏杀,竟能死伤几敌!

平山流传有“八十一不知道”。鬼子举刀进行了九九八十一问,81颗滴血的

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之时,会闪烁出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智慧的光芒。抗日战争将成为中国作家永恒的题材,世界性的题材。

抗战时期,茅盾、巴金、老舍都怀着巨大的热情,为了“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使人看出“黎明的希望”,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投入到抗战文学的写作中。可这三位作家对自己的抗战小说都不满意。其实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好作品。

我们今天写这场战争更难,我们有一些让人耳熟能详的作品,我初中时就看过《铁道游击队》《苦菜花》《大刀记》《桥隆飙》等,后来又有《红高粱》。让我感触很深的还有穆旦的诗篇。穆旦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根据人编作战的经历,他创作出了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纪念远征的抗日英灵:

在阴晴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头颅铿锵有声的答案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通过寻找,我的认识和情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烈士就义是历史纸页上的,而现在,这些烈士都活生生如在眼前。每一次采访那些90多岁的抗战老兵,讲到那些烈士,他们都会长时间地哽咽难言,88岁的烈士的妹妹栗政华,含着泪水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我思念我的哥哥政通,你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你是我最佩服的英雄!”望着她一头柔软的银发,我找到了那些历经70年光阴阴不能磨灭的情感,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历史不容忘记,历史从不会忘记!



儿童电影《鹰笛·雪莲》来了

□周思明

每年的暑假假期,电影市场为孩子们提供的只有几部动画片。再就是进口大片、武侠片、武打片、功夫片,银幕上充斥着血腥暴力。已经很多年了,没有一部反映儿童现实生活的电影在假期档的院线上映。

这种情况终于被打破——儿童电影《鹰笛·雪莲》来了。

在公映前的看片会上,它被誉为最适合合家老少共同观看的电影。它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神秘的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上,那里有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和汉族孩子们团结友爱,亲如一家、丰富多彩别样生活。

电影以循序渐进的推进方式,次第展开都市男孩阿泉去到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米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住到塔吉克族老爷爷阿米尔家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阿泉和阿米尔的孙儿库力恰克、孙女古丽娜娜、古丽娜娜的汉族好朋友韩晓雨,以及维吾尔族小伙伴伊明很快玩儿到了一起。电影呈现了多民族团结融合、亲如一家的温馨画面;讲述着有趣、新奇、惊险、深情的感人故事。

阿泉渐渐发现了阿米尔爷爷有一个秘密——他有一支高高挂在房柱上的鹰笛,不准任何人触碰。好奇心的驱使,让阿泉和库力恰克、古丽娜娜、伊明、晓雨想一探究竟。阿泉经不住库力恰克的怂恿,趁阿米尔爷爷外出睡觉,总想偷偷从房柱上取下爷爷的鹰笛。爷爷发现以后没有惩罚阿泉,反而很温和地告诉他,鹰笛是由鹰的翅膀骨做成的,都是两支在一起吹,而爷爷现在只有一只。另一支鹰笛埋在了有雪莲花的地方。

阿泉要去雪山帮爷爷找回那支鹰笛,也想采到雪莲花送给爷爷作生日礼物。小伙伴们劝阻不了阿泉只得决定帮助他。于是五个勇敢的萌娃开启了他们的雪山寻笛之旅,并遭遇了未曾料到的雪山风暴……

好像已经是一部好看的、完整的电影了,然而这只是它的一半内容,可以称其为“前台故事”;另一半内容是更加富

有深意的“后台故事”。

2013年8月,这部电影的编剧兼制片人苏曼华为采访“深喀家庭1+1”活动(深圳和喀什地区的各50个家庭结成对子,这些家庭的孩子成为好朋友,他们像走亲戚一样互相来往),去到位于新疆帕米尔高原上的喀什米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与热情好客的塔吉克老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里民风淳朴,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和汉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和睦相处,亲如一家。苏曼华被深深感动了。她亲眼看到了新疆多民族共处团结和谐的景象,有责任和义发出声音。她用塔吉克人阿米尔从童年到老年60多年间与解放军边防驻军林叔叔一家四代的生死情谊作经线;以当代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和汉族孩子之间的友谊作纬线,精心编织了一个震撼人心、感人肺腑的故事——

1952年春,放羊娃阿米尔被从未见过的隆隆开来的大卡车吓傻了,解放军林叔叔从车上下来把他抱到路边。后来阿米尔与林叔叔的儿子林企山一起长大,两人像亲兄弟一样亲。在一次雪崩中,企山为了救阿米尔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企山的妻子承受不住打击得了重病,阿米尔收养了企山的儿子林佳木。到了上学的年龄,阿米尔又把佳木送回内地。佳木成家立业后定居在深圳,而阿泉是佳木的儿子、企山的孙儿、林叔叔的重孙。四代人的生死情谊反映着两个民族的亲情。在这个暑假里,佳木把自己的孩子阿泉又送到阿米尔身边,让他代替自己陪伴爷爷一段时间……于是孩子们之间又结下了新的深厚友谊。代代传承,生生不息,这部电影的思想内涵、人文色彩骤然间变得厚重起来。温情溢满心头,让人潸然落泪。

从艺术美学的层面分析,这部儿童电影采取了先松后紧、渐入佳境、中间插叙、形散神聚的手法,这既适合少儿观众的欣赏习惯,也能给孩子和家长以更多的思考空间。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如同我们



社会上自然生态事物在减少,近些年文艺作品中的自然描写也在大量减少,很多时候自然已经完全退出了文学、影视作品。散文家鲍尔吉·原野认为,如果一个民族能够产生写自然写得特别好的作家,证明这个民族对大自然是感恩的。文艺创作,尤其是在大自然的亲近和陶冶中创作,不仅会使创作者心灵变得单纯,也会使欣赏者感到宁静而幸福。令人欣慰的是,《鹰笛·雪莲》正是一部与大自然亲近、在大自然里创作的作品。影片中的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遗世独立的雄奇风光、雪山冰峰、高原湖泊……纯净绝美,令人沉醉。异域特色美食、绚丽多姿的新疆歌舞、惊险刺激的高原赛马等等,让影片中来自内地城市的阿泉、晓雨大开眼界。大自然毫不吝啬对他们敞开怀抱,激发出他们最天然的真童、童趣。与此同时,也会让坐在大银幕下的少儿观众及其家长们大开眼界,心旷神怡,感同身受地融入帕米尔高原的大纯大美之中。

现代都市儿童阿泉和晓雨的高原之行,是一种体验生活之旅,与时下大热的生活类角色互换电视节目《变形计》有些相似。但影片除了阿泉的“变形”,更多是体现孩子们勇敢的求知探索精神以及在孩子们身上所蕴涵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仁、爱、孝、义。虽然电影发行商为更好地推销影片,以所谓“真人版儿童探险影片”为宣传推广旗号,但在在我看来,电影在好玩、有趣、惊险、猎奇等元素

之上,还有更为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可以说,《鹰笛·雪莲》在思想境界追求上已经上升到了各民族团结和谐、人心向上向善的精神高度。这也正是编剧兼制片人苏曼华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

苏曼华2001年进入儿童电影创作领域,她一向坚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创作态度。十几年前,为了电影《我们手拉手》,她曾六上井冈山;现在为了电影《鹰笛·雪莲》,在70岁的年龄,她又三登帕米尔。这部电影全程都是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喀什米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拍摄,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高原缺氧,每天都有人晕倒,有人住院。剧组把一辆面包车改装成救护车,还聘请了跟组医生,即便这样,苏曼华在拍摄期间仍然没有一夜能睡好觉。制片人摄制组的最高责任,她得为全剧组的生命安全负责。她自己也有高原反应,影响到心脏,两只脚穿不上鞋子。从2013年8月去帕米尔采访,到2014年5月带领主创团队去塔什库尔干做电影开机前的准备,再到2014年7月18日,电影《鹰笛·雪莲》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开机拍摄直至关机,现在已是第三个年头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鹰笛·雪莲》在看片会上好评如潮。电影风格活泼、欢快、淳朴、厚重,通篇透出新疆地香醇的泥土味、牧草味、奶茶味,带有强烈的人文情怀与民族精神。这是一部值得用心观看的儿童电影佳作。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当我们回首抗日战争时,我们可以看到抗日战争的过程是艰难、惨烈和充满曲折的,抗战的胜利来之不易。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抗战之前,中国并没有形成清晰、明确、坚定的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这与当代中国有着鲜明的不同,我们只有回到历史的现场,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抗战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的意义。

在传统中国,民族意识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身份认同标准,在“天下”与朝贡体系的视野中,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否是区分文明与野蛮、中国与外国的重要标志。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转型,文化主义慢慢消退,民族意识才慢慢觉醒。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孙中山“旧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主要针对的是满族与清政府,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主要是驱除满统治,恢复汉族的政权;只有到了“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所针对的才是外国列强,要求恢复中国的主权。只有在抗战中,中国才逐渐形成了清晰的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无论是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还是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意识都成为区分敌我、内外的重要标准。

在民间也是如此,只是过程更加艰难曲折。在萧红的《生死场》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的艰难过程。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这个小村庄的村民在最开始并没有民族意识,他们没有见过日本人,不知道日本人的入侵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为一只羊相互争斗,为邻里纠纷互相争吵,为生老病死而痛苦,他们沉浸在村庄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的苦恼是劳作的艰辛,是生育的艰难,是生为女人的不幸,或者乡下人进城的卑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可以看到阶级意识与女性意识的萌芽,但只有他们亲眼看到日军的残暴无情之后,才会意识到这是另外一种人,才会有民族意识的觉醒。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民族主义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想象的,而且是在被侵略、被欺侮与被损害的历史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生死场》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的民族意识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在血与泪中诞生的。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经验与痛苦在觉醒,比如小说中写到,“金枝鼻子作出哼声:‘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这看上去似乎不成逻辑,但她是带着女性的痛苦经验开始觉醒的,她的民族意识有着个人的内在逻辑。再比如小说中的二里半私心更多,他不舍得他的羊,但在小说的最后,“二里半的手,在羊毛上惜别,他流泪的手,最后一刻摸着羊毛。”二里半终于克服了个人意识,走上了抗争的道路,他的觉醒是艰难的,也是深刻的。惟其如此,才更真切,才更动人。

现代民族意识是民族觉醒的前提,没有民族意识,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及其胜利。民族意识的觉醒是艰难的,《生死场》生动地描绘了这一过程。在这里,我们也应该强调,文学在现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中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像《生死场》不仅描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这一小说的写作、出版、传播本身,也是现代民族意识宣传与社会动员的一部分。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重读萧红的《生死场》以及其他优秀的抗战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如何艰难,也可以看到抗战的最终胜利是如何来之不易。只有认识到抗战的艰难、惨烈与曲折,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先辈是在历史绝境中突围,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抗战胜利对于中国的伟大意义。

■评点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拍摄的众多影视作品中,河北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金鼓槌》是一部别开生面、另出机杼的佳作。它根据1940年春天发生在我省冀城地区的一个真实历史事件而创作,讲述了一个悲壮、凄美而冷峻的独特的抗日故事,以小见大地从另一个视角反映了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具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和观赏价值。主人公金鼓槌是一个身怀家传高超鼓艺的普通年轻人,活泼而幽默,在他常有的“坏笑”和眼神中闪烁着几许机智与狡黠。电影在金鼓槌深情旁白中娓娓地展开叙事。

导演王家卫曾说:“影像是一种感觉的捕捉”。从本质上说,电影是一种视听符号的运动。这部电影不仅对冀中平原农村的古朴风貌和风俗有着颇具视觉冲击力的捕捉,更可贵的是它塑造了一个有变化、有发展、有性格、有血性、有担当的主人公金鼓槌的艺术形象,表现了他从小爱到大爱、从恐惧到无畏的生命历程;敲爆了埋藏在太鼓中的炸药,炸死日寇小队长和12名士兵,自己也壮烈牺牲。

如何将这样一个故事讲好,考验着创作者们的功力和智慧。有人说,简练是才能的姊妹。这部电影把抗日战争的宏大主题,寓含在一个乡村平民的悲壮故事中,充满民族的尊严和人性美、爱情美的内涵;在简练的、颇具特色的镜头运动中,让观众深深地感受到一种情感和意象的延伸,不仅作用于观众的感官,而且触及心灵。这种欣赏情境的获得,在于编导采用了“两极张力”的艺术结构——敌我、爱恨、悲喜、强弱、误解、镜像……无不显示出编剧、导演姜洋孜孜以求的匠心独运。日寇小队长石原一郎伪善、凶狠而狡诈,他带兵追捕我受伤的八路军交通员而冲破了喜气洋溢的金鼓槌的婚礼,阴险狡诈,由喜而悲。金鼓槌对剪纸能手彩铃姑娘由暗恋进而到无所顾忌地狂热追求,但彩铃并不喜欢他,一热一冷,形成了强烈的感情落差,令观众悬想并忍俊不禁。金鼓槌与石原一郎因故交集,令他父亲和乡亲们产生误解;彩铃义救八路军伤员被误为男女私情遭人责骂,这些都形成了两极情感的激烈碰撞。特别令人称道的是金鼓槌的思想性格脉络的逐层揭示,从对彩铃爱恋的“小爱”,发展成对民族大义、对乡亲、对家乡的大爱;从开初对日寇暴行“怕怕”的恐惧到无畏地击爆炸药的惊天一击,具有无可辩驳的思想、性格、情感变化的逻辑力量,使金鼓槌的形象得以升华、永生。

这部电影还很重视影像的视觉效果和音响的听觉冲击力,如彩铃给伤员送饭的多次山间行走运用了“两极镜头”,从而显示出剪影效果;强弱、节奏不同的鼓点声,和谐地配合着剧情的进展,从而成为这部作品的有机组成元素,敲击着观众的心弦。山乡月夜、溪流等空镜头的运用也恰到好处,营造出宽阔的审美空间。三个主要人物的刻画也是出色的。在短小的一部电影作品中有如此多的看点、笑点、泪点和动情点,实属难能可贵。

但是也有美中不足:金鼓槌以及当地群众的高超鼓艺及其阵容和气势表现不够酣畅和震撼,与石原一郎的鼓艺“对决”更缺乏表现。但瑕不掩瑜,《金鼓槌》堪称我省近年电影作品中的佼佼者和新成果,则是肯定无疑的了。

抗战与民族意识的艰难觉醒

——重读萧红的《生死场》

□李云雷

电影《金鼓槌》:从恐惧到无畏

□戴白夜